



呼唤“归雁”

本报记者 朱婷

■ 故事

从湖南省长沙市区出发，驱车不到1小时就到了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盛夏的绿荫之中，道路两边是青瓦白墙的农家小楼，湖面上倒映着游人身影。

开慧村，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这里原本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文化示范村。

面容清瘦，声音洪亮，谈笑之间以“开慧村民”自居、年近古稀的朱有志，已经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13个寒暑。

“我这个‘村官’是讨来的。”2009年岁末，时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的朱有志，主动向组织申请，当上了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来开慧村之前，朱有志主要从事经济哲学、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在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期间，朱有志的理论研究工作多次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原来我在大学和社科院工作时，领导的是知识分子，现在领导和服务的对象是农民。”朱有志坦言，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民有些话听不懂、听懂了做不来、做来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没效益。

“跟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厌恶的是你看不起他，烦你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就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去干农活，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朱有志表示。

2014年，朱有志主导“开慧大道”立项。开工时，有些村民不理解，不仅反对还骂人，甚至有人背地里说“滚出开慧村！”但朱有志继续为开慧大道的修建在省、市、县、乡、村来回跑，四处筹措资金，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实施自筹、自建、自用、自管，做了大量群众工作。

2017年，长度3.8公里，连通开慧镇与弼时镇，打造杨开慧纪念馆、任弼时故居、缪伯英故居“三点一线”跨区域红色旅游干线的开慧大道开慧段正式通车。道路的开通，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为发展红色旅游打通了交通“命脉”，来开慧村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更为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有志理解老百姓的“不理解”：“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感情疏远了，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憋了一肚子气。村干部缺乏与农民的交往、交流、交心、交谈，这就要理解、关心农民，找到我们工作的差距。”

如今，在朱有志和支村“两委”、乡贤、乡村人才、致富带头人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开慧村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村民入合作社后，土地统一流转给合作社，成立了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并在每个合作社成立了党小组。“把合作社做强，农业自然强，村级集体经济就有支撑。”

在开慧村，朱有志结合实践，探索乡村治理的“四自模式”和“双向耦合、四层协力”模式，解决了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

对于村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找村干部办事方便了，对党的政策、中央的精神更了解了。朱有志提出，把村里的党建工作做好，其他工作才有坚实基础。在村里把党联系群众的制度构建起来，才能打通党建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毛泽东曾写下深情的诗句，怀念其革命伴侣杨开慧。朱有志重视的另一件事，就是弘扬“开慧精神”。他说，“开慧精神”即“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勤于学习的科学精神、乐于助人的利他精神、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贯穿了杨开慧同志短暂的一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开慧村村委委员缪亚林眼里，朱有志是一位“工作狂”。“到开慧村以来，他除了在长沙开会、调研外，其他时间几乎泡在村里，有时为了研究村里的事情，经常开会到晚上11点多钟。村里的干部刚开始还不适应，现在都习以为常了。”缪亚林动情地说，一位退休的正厅级干部，为了开慧村的发展，一不拿村里的工资，二没有任何补贴，如果不是和他共事这么久，还真让人难以相信。

当了村官又当村支书，有人开玩笑，说他“能说洋话（英语）、会读古文、敢打官腔（作报告）、爱讲土话”。朱有志对这一评价颇为欣慰，“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有时代情结，想为党、为人民群众多做点实事。”这些年，担任村第一书记，他和村民一起下地打稻，一起修路架桥，一起流汗流泪，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

在开慧村村部朱有志的办公室，有厚厚一摞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开慧村语”，这些日记，记录了他从2009年担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来的经历和思考。这些年，他婉拒了民办本科高校和企业200万元年薪的聘请，把自己定位为“当好村民经济发展的智库”，一心一意干起了“村官”。

今年初，他被评为了2021年“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不久前，长沙县首届社会贤达推选结果发布大会举行，他被推举为“十佳”社会贤达之一。皮肤晒得黝黑，微信名也早改成了“开慧村民”。朱有志表示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农业农村问题常搞常新。”

“从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看，广大农民对党是热爱的，对基层党组织是信赖和支持的。眼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生产体系已经形成，未来还将有很多探索。进一步发展好村集体经济，我有信心！”朱有志说。

『开慧村民』朱有志

本报记者 朱婷

民发展产业，人均年收入翻了一番……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难免有不少矛盾。乡贤在村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实现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20世纪，‘将军农民’甘祖昌和‘老阿姨’龚全珍开社会主义中国式‘告老返乡’之先河，回到农村带领乡亲发展农业产业、推动乡村治理、宣传党的声音，是不忘初心的典范，其事迹在当前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刘木华说。

留住乡愁根脉

跟随着老照片、老物件、历史典故了解村居文化，跟着乡贤足迹学习乡贤榜样……连日来，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泰顺县、苍南县等地的乡贤馆成了孩子们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孩子们纷纷走进新乡贤馆，聆听新乡贤故事，感受新乡贤文化，感悟新乡贤精神。

据介绍，温州市努力把乡贤阵地建设成为乡贤礼遇中心、乡民议事中心、乡亲联络联谊中心、乡风引领示范中心。截至目前，全市已建设95个镇（街）级以上乡贤馆、乡贤会客厅等乡贤阵地。

“每到月底，我把村里的乡贤达人、产业能人组织拢来，到村里的乡贤会开月例会，集思广益，解决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浦溪村主任武长保向记者介绍，该县采取多种方式畅通乡贤发挥作用渠道。得益于乡贤助力，该村荣获“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村里的乡贤会所也成为各级参观调研、交流学习的打卡点。

“在当代，虽然我们的乡土社会正逐步被现代社会替代，但乡土观念仍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特别是现在很多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乡土情结依然很重。”麦康森对记者表示。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递交了一件《关于鼓励退休人员回“老家”发挥余热打造新时代“乡贤”》的提案。

“目前来看，年轻人因工作、思想差异等原因回乡发展相对困难，退休人员回乡相对约束因素较少，较容易可行。”麦康森表示。他认为，鼓励退休人员回乡有很多可行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告老还乡、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退休人员也具备回“老家”发挥余热的良好条件：退休人员大多有知识、有阅历、有资源，干事有办法，完全有能力带领父老乡亲搞建设、搞发展。

他同时表示，退休人员回乡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很多农村人才离开后到城市安家落户，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都已经没了，在住房、医疗方面都需要更多保障。他建议相关部门全面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层面中存在的阻碍退休人员回乡的不利因素，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探索乡贤回归创业奖励补贴政策，破除宅基地、医保、创业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们要给回乡发展的乡贤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还要让他们留得住、用得好。”刘木华认为，政府部门也要加快补足乡村交通、卫生条件等方面的短板，为乡贤与乡亲们建设秀美乡村打牢基础设施的硬件平台，让他们能更好地投身家乡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要加大‘新乡贤’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退休人员以及从村中走出的‘能人’‘达人’‘贤人’回乡造福。”麦康森说，乡村振兴呼唤更多“归雁”，而鸿雁归巢，必将带动乡村长远发展，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很有必要树立一批回乡带领乡亲建设家乡的优秀乡贤典型，鼓励更多乡贤返乡发展，带动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对记者表示。

“乡村振兴最核心的是‘人才振兴’，要鼓励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员回村发挥作用，打造新时代‘乡贤’，弥补乡村振兴的人才缺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说。

在他看来，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人才流失加剧，且返乡回流渠道相对不畅，导致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不牢。而我国每年有大量原本来自农村的人员，他们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资金技术和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有“落叶归根”的情怀，是乡村振兴的宝贵人才资源。

群贤共治，助力基层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既涉及乡村的产业发展、农民的生活富裕等物质层面，也涉及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生态文明等精神层面。“新乡贤”群体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化解、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刘木华认为，乡贤因自身的品德学识、热心乡村公共事务、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得到农民的尊敬与信服，在农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县西冲村，3年把西冲村从一个落后村转变为“岳阳第一村”；海南省原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务农，让松梅村面貌焕然一新；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退休后回到家乡安图县石门镇大成村务农，带领村

“鸿雁”归巢，激活一池春水

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兴隆场镇密灯村，层峦叠嶂、云雾缭绕之间，千亩茶园生机盎然。“今年村里种植生态白茶3000多亩，发展势头非常好，大家很有信心。”谈起村里的产业发展，村支书向水珍直言，乡贤能人功不可没。

密灯村地处泸溪县中西部，群山环抱，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富含硒元素。2018年，在外打拼事业有成的唐荣芬毅然返乡创业，成立密灯众诚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白茶种植。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密灯村白茶产业蓬勃发展，去年白茶销售额达1800余万元，带动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800余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泸溪县积极开展“统战+乡贤”工作，深挖乡贤人才资源“富矿”，以乡情、乡音为纽带，搭平台、优服务、聚合力，团结引导广大“新乡贤”为家乡建设汇聚智慧和力量。近两年来，吸引600多名优秀人才回乡创新创业。

泸溪县的实践，正是全国各地吸引“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各地纷纷搭建平台、出台政策，吸引新乡贤回家的“归雁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力。

乡贤，顾名思义，就是乡里的贤人，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乡”是“贤”的“籍贯”，表明其在乡村的经济基础、社会根基和文化认同。较之传统的乡贤概念，新乡贤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随后，“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同样指出，要让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

的“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而他们回不了家既是“不愿”，也是“不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新乡贤这一群体，推动乡村振兴，重塑乡村文明，让广大农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留得住一份乡愁，值得我们思考。社会贤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守护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向作用，这正是当下农村呼唤乡贤“回归”的意义所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亿万农民走向城市，融入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

国际化，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成长为新乡贤。如今，乡村振兴战略为新乡贤创造了更广阔的舞台，也让我们们的乡愁得以安放。在新乡贤身上，集合了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的要素和文化融合，结合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优势和联系，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在外面“出息”了的乡贤，愿意回到家乡，反哺家乡，为乡村振兴尽一臂之力。

“出则兼济天下，归则回报桑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

兼济天下，造福桑梓

本报记者 朱婷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是《桃花源记》中描绘的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村落景象。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滋养城市社会的丰沃土壤，其发展走向一直是左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不断遭到侵蚀，乡土受到严重冲击，在乡村伦理生活中能起到身教言传之效的乡贤群体愈加稀缺。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文中就已敏锐地指出，乡村人才的大量流失打破了中国传统

失常中心原主任张澍发出了这样的倡议：“乡村振兴发展，时不我待；美丽乡村建设，你我共责……诸位委员乡贤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做好乡贤，回报家乡，那里有我们的兄弟，有我们的姐妹，有我们的父老乡亲。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让我们一起回报家乡，一起助力乡村振兴。”

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追寻乡贤足迹，厚植家国情怀，是不容忽视的一课。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正在凸显。各级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新乡贤的作用，厚植乡土文化，探索建立壮大新乡贤群体机制，激发他们回乡建设的热情。让新乡贤们既“愿”回家，也“能”回家，为乡村振兴凝聚强大力量。



在杭州市萧山区三联村，新乡贤代表、党员志愿者方刚（中）在乡贤工作室的直播间和其他乡贤一起直播推介农产品。 新华社发



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

■ 记者手记